

17

- 我写《大寨内参》的前前后后
- 薪春——享誉海内外的“教授县”
- 我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
- 治水省长张体学
- 武汉城建往事
- 民国元老何应钦沉浮录
- 美丽丰富神奇的一生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九九年第三辑(总第六十辑)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时 代 追 踪

- 我写《大寨内参》的前前后后 李玉秀(1)
薪春——享誉海内外的“教授县” 朱鸿考(17)

沧 桑 看 云

- “文革”前湖北省政协学习工作的回顾 周云蒸(22)
湖北省政治学校的发展和演变 胡德林(29)
悠悠梁子湖 巍巍青山窑 陈文学(37)

名 家 谈 往

- 攀峰与穿雾(连载之三) 刘西尧(48)
我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 曾 卓(67)
一个梦接着一个梦 李德复(79)

江 汉 寻 梦

- 治水省长张体学 薛 毅(84)
武汉城建往事 孙宗汾(91)
一报卓荆楚 金仁章(103)
李明灏副主席晚年轶事 史 振(108)

史林探奇

民国元老何应钦沉浮录..... 银 飞(115)

闻人聚焦

说不尽的张学良(连载之二)..... 王朝柱(135)

美丽丰富神奇的一生..... 洪 洋(146)

李玉秀

我写《大寨内参》的前前后后

从1964年我写《大寨内参》至今,已经过了35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不断有朋友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叙述这件事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我对自己亲自经历过的这段历史,却始终未写过片言只语。其原因是:一则是事情已过去了35年之久,自己不愿再去回忆那段不愉快的历史;其次,即使一些朋友在叙述那段历史事件中,有些个别事实稍有出入,或者一些提法不那么准确,但也不值得再去评论;三是如今社会上新闻官司案件频频发生,报纸刊物批评报道显著削弱,指名道姓批评了某些人和事,不管批评得是否正确,便告你侵权,引起一场没完没了的官司,这实际上是限制了舆论监督的权利,令人顾虑重重。

最近,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的几位年轻朋友,热情要求我写写这段历史,以还历史本来面目。在他们的支持下,我鼓起勇气,遂根据回忆写了下面的一段文字,也算是我对这段经历的一个客观说明。

毛主席、周总理肯定大寨典型

山西省有两个大寨。一个是榆社县张志全领导的大寨;一个是昔阳县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两个大寨都是山西省的先进典型。两人都是全国劳动模范。

昔阳县大寨生产大队,是太行山区的一个穷山村。全村共有

75户人家,802亩耕地。人们说它是个“小大队”、“大小队”。建国以后,这里的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陈永贵任社长,贾进才任党支部书记。1953年,贾进才让贤,推荐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当副书记。贾进才让贤的故事,被传为佳话。大寨大队在陈永贵领导下,全村干部、群众团结一条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农业生产搞得有声有色。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最先发现并在全区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中共山西省委从1960年起,先后发出“学习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山西日报》发表了题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陈永贵在山西省劳模会上介绍了大寨的先进经验。

1963年8月,大寨遭受了一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风雨引起的洪水灾害。全村八百多亩耕地,被洪水冲毁130多亩;145孔窑洞,被冲塌113孔,125间房屋,冲塌77间,另外还有60多间被冲成危房,不敢住人。地里的庄稼被洪水冲的倒的倒,毁的毁。大寨农民十几年修起的梯田,土层被冲走了,有的被冲塌。这是一场毁灭性的灾害。大寨呈现出一片悲凉凄惨景象。许多农民痛哭流涕。

当时,陈永贵正在昔阳县城参加县人代会议。听说村里遭受了特大洪水灾害,他急如星火,匆匆赶回村里。群众见到他便抱头痛哭,说:“永贵,咱遭了这么大的灾害,以后怎么活?”陈永贵问道:“人被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干部群众答道,人都在,牲口都在。他高兴地说:“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死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好事,应该高兴。”大寨人以革命的英雄气概,向洪水带来的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提出“三不要”与“三不少”的口号。“三不要”是:不向国家要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资;“三不少”是:原计划国家的征购粮、集体储备粮和社员的口粮不少。陈永贵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实现大灾之后“三不要”、“三不少”的豪迈口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笈高度评价了大寨人的英雄行为与高尚品格。

1964年3月29日,毛主席召集河北、山西两省的主要领导人座谈,陶鲁笏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寨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领导群众,在严重洪灾面前,以惊人的毅力,顽强战斗的精神,重建家园的动人事迹。并提到,陈永贵在同灾害斗争中充分显示出领导才能,他不仅是生产能手,而且是一位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经过实践,摸索到生产管理上“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的经验。当时,《人民日报》突出报道了大寨大队在贫瘠的山沟里,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先进事迹,并发表了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这些引起了毛主席对大寨大队和陈永贵这个先进典型的重视。听完陶鲁笏的汇报,毛主席非常高兴,他以肯定的语气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

那时,新华总社和山西分社也非常重视对大寨大队的报道,将大寨这一典型作为重点进行连续报道。1964年春,分社派出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去大寨采访,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大寨之路》长篇通讯的初稿。当时担任新华总社副社长的穆育同志专门派人来山西分社具体研究,对通讯进行了加工修改。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并配发了社论。通讯以大量生动感人的事实,热情赞颂了陈永贵领导大寨群众依靠集体力量,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魄和不怕苦、不怕累,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战胜史无前例的特大洪水灾害的惊人创举,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彰了昔阳县大寨大队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称赞大寨大队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生产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范。周总理将大寨精神概括为:“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号召全国农村学习大寨精

神。

这段历史表明,大寨大队和陈永贵从50年代起,听党的话,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搞好山区农业生产建设、改变大寨穷困面貌,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这种英雄业绩与革命精神,受到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对于这段光荣历史,大寨群众和全国人民作了高度的公平的评价。陈永贵的历史功劳将永远载入史册。

劳动模范也有缺点

先进典型、劳动模范,并不是一切都先进,也不是永远先进、永远是模范。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就会走到事物的反面,这是一条客观规律。同样,作为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在宣传报道先进人物时,永远都要坚持实事求是,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永远不能有偏激情绪、片面观点,丝毫不能添油加醋,拔尖提高,更不能无中生有。这是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应起码具备的优良品德,也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与资产阶级新闻工作最本质的区别。

就在全中国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宣传大寨大队和陈永贵先进事迹的同时,我耳朵里也不时听到各处传来有关陈永贵和大寨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沸沸扬扬,议论不休。其中反映较多的是关于大寨大队少报土地亩数和隐瞒粮食产量、陈永贵作风上滋长的骄傲自满、不可一世的毛病,也听到关于陈永贵个人历史上的问题。

1963年6月,以李顺达为首的山西晋东南地区平顺、陵川、阳城、武乡、晋城等17个县市24位农业劳动模范,到大寨参观学习。李顺达是早在1944年和1946年两次出席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劳动英雄大会、受到党和政府奖励的劳动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20年来都被评为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李顺达、郭玉恩、

武侯梨这些全国著名的老劳模，个个都是种地的行家，有关种庄稼的事情都瞒不过他们。他们认真参观学习了大寨的先进经验。但是，大家对大寨的土地亩数发生怀疑，认为实有耕地面积与上报的数字大有出入。陈永贵介绍说，合作化十多年来，大寨每年整修土地，增加了大约 120 亩耕地面积，但这些土地种了果树，所以不能算耕地面积。劳模们也认为，大寨每年整修土地，里砌外垫，耕地面积肯定有所增加，陈永贵说这些新增土地都种了果木树，可是大家在参观大寨田时，却很少见到果园和果树。

李顺达问陈永贵：“现在，每天来大寨参观学习的人这样多，接待任务很重，你又经常外出开会，你一年是怎么做到 300 个劳动日的？”陈永贵说：“社员照顾我，让我干些包工活、近地活，有些队干部还帮我干点活；干垒堰的活，我一个人算一个半人。这样满打满算，去年实际做了 290 个劳动日，队里还给补贴了 50 个劳动日。”听了陈永贵的解释，人们也不好仔细追问，但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

山西省太谷农学院常驻大寨的一位科技工作人员，也讲了一些情况。他从大寨播种的种子数字推算，大寨耕地面积可能是 1200 亩。

关于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有人查阅敌伪时期档案，发现敌伪情报人员登记表里，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 1942 年他曾参加过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过情报。

在全国上下一片赞扬声中，新闻媒介大肆鼓吹下，陈永贵成为全国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只能表扬，不能批评，有点盛气凌人。大寨大队成为全国特殊典型。大寨大队自立的有些规矩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新闻记者去大寨采访，不准参加村里的党支部会、社员会议和其他活动。不经过批准，不能去社员家里进行采访，不能和社员一同下地参加劳动。记者不得绕开党支部向社员了解大寨的情况。陈永贵在大寨一手遮天，个人说了算。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

个故事。有次去大寨采访，陈永贵外出，他找到另一位大队干部想谈谈情况。那位干部痛快地答应了。过了几天，不见动静。他第二次去找他，答复说：“行，咱安排个时间。”又拖了几天，仍未谈。再次找到这位干部时，他面有难色，说：“老陈不在，不好谈。”实际上是陈永贵没有定下调子，他不敢谈。

大寨确实是一个采访非常困难的地方。记者在那里，没有采访的自由，也没有发稿的自由，记者们走到一起发牢骚，讲怪活，说大寨是“党中央直属支部”，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敢管，谁也插不进去，谁也不了解情况。有些记者不愿意去大寨采访，但又不能不去，不敢不去。因为报道大寨已经成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我当了几十年记者，采访过许多先进典型和英雄人物，类似大寨这样的情况，还是闻所未闻，绝无仅有的。

在我们的脑子里装着两方面的情况。主要是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也有一些缺点。从我内心讲，对毛主席、周总理肯定的大寨和陈永贵这一典型和他们的感人事迹非常敬佩，心服口服，真心实意想把这一重大典型宣传好、报道好。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闯下了天大的乱子

1964年春天，我和山西分社记者田培植，摄影记者周树铭去昔阳大寨采访。我们去大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报道大寨春耕生产准备的情况，对大寨作连续报道。我当时的想法是，对于陈永贵这一全国著名的先进人物，要做好公开的正面宣传。当时并不曾想过要写内参，更不是去挑毛病。我的心灵深处存在一种想法，把陈永贵当成了“百宝箱”、“百花树”、“一俊遮百丑”。似乎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每个部门和每项工作，大寨都应是当然先进，当然模范。事实上，这种想法和做法本身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了思想上的形而上学。

大寨果然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们不能参加村里的任何会议和活动，不准随便到社员家里串门，更不许找社员采访。当时陈永贵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没有他定调子，其他队干部也不敢接谈，我们的采访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大寨正在搞“四清”，对记者更是绝对保密。“四清”工作组组长叫刘德怀，是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是位作家。虽然我们是老朋友，过去见面无话不说，但他这次对于大寨“四清”的内容，却守口如瓶。我们三名记者住在大寨，真有点度日如年的感受。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从未遇见过的情况。但是，宣传大寨既然是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纵有再大的困难，也要知难而进。

在大寨进行艰难采访时，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来大寨考察工作。他是政府官员，又是副省长，“四清”工作组对他殷勤接待，还要向他汇报工作。我和王中青以往常打交道，处得很熟，他见到我便说：“大记者，今晚‘四清’工作组给我汇报大寨‘四清’情况，你有没有兴趣听听他们汇报？”新闻记者最大的兴趣就是了解新闻。我便欣然同意，并高兴地开了个玩笑，说：“谢谢省长关怀。”

当晚，我和田培植听了“四清”工作组的汇报。他们除充分肯定大寨大队几年来农业生产发展的成绩，也谈到了大寨少报耕地亩数、隐瞒粮食产量的问题，以及陈永贵在大寨一手遮天、骄傲自满、独断专行等作风问题。陈永贵上报：1963年大寨遭受特大洪灾，粮食亩产创造700斤的最高纪录，今年（指1964年）要粮食平均亩产跨长江，超过800斤。因为少报了土地，粮食平均亩产自然就高了。事实是，大寨大队在合作化时期耕地面积就是802亩，十多年来，每年整修土地，扩大面积，现在仍然上报802亩那个老数字，显然存在虚假现象。汇报中还引用了常驻大寨的科技人员以播种的种子数量推算，大寨的耕地面积可能是1200亩的例子。

此外，工作队还讲到陈永贵对“四清”工作组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有意整垮大寨这面红旗。

“四清”工作组的汇报，引起了我思想上的震动。我感到，陈永贵弄虚作假，少报耕地亩数，虚报粮食产量，涉及到一个劳模的品质问题。回到太原，我便向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史纪言详细汇报了上述情况。史纪言同志是我当年参加太行《新华日报》工作时的老社长，是位可亲可敬的老领导。他认真听取了我的汇报。同时，山西分社又向总社国内部电话汇报了上述情况。总社指定让我们去北京进行详细汇报，于是我和田培植去了总社。国内部农村部、内参组负责同志听了汇报，认为有必要向党中央反映这些情况，提出让我写篇内参。我再三说明，这些材料是听大寨“四清”工作组向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汇报的情况，记者没有进行核实。大寨是毛主席、周总理肯定了的典型，应该更加慎重。总社国内部，特别是内参组的负责同志坚持认为应该向中央反映。

我之所以在最后接受了内参组负责人的建议，主要是考虑到，新华社是党中央的耳目喉舌，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自己了解到的真实情况。这是无产阶级新闻记者的光荣职责。而且，从我所了解的一些重要情况，也值得让中央了解全面情况，便于对陈永贵进行培养教育，促进他健康成长。在我的思想深处，丝毫不曾想过反对大寨，更不曾想过反对毛主席树立的大寨红旗。天地良心，敢对日月。于是，我和田培植分工，他写公开报道，我搞内参。

我在总社写稿时，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知道他从哪里得知，我在总社写内参稿件，他让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刘贯文，几次打电话找我，企图劝我不要写大寨和陈永贵的内参，但终未找到。我交稿后，总社社长朱穆之当即签发。

新华社的内参统称《内部参考》，但分几种级别，我写的内参刊登在《记者反映》，这种刊物保密性更强，只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参阅。

周总理看到这份内参，立即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

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山西省省长卫恒找到中南海询问情况。总理严肃地说:“如果大寨耕地亩数确实有虚假,外国记者捅出去,国际影响很不好。”他指示要立刻派人到大寨重新丈量土地。于是,当即组成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晋中地委、昔阳县委派人参加的五级联合丈量土地队,奔赴大寨。

我们的这篇内参惊动了周总理,华北局和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又组织了从中央到县委五级丈量土地队,确实称得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我从北京回到太原,省委秘书长史纪言立即将我叫去,问:“你到总社写的内参,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惊动这么大。”我说:“就是我给你汇报的那些情况。”他追问道:“还有什么?”我说:“内参里写的情况、问题,都是给你汇报的问题,除此以外,再无别的材料。”这时,我思想开始有点紧张,心想:这一次可捅了马蜂窝。

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刘贯文从北京归来,就给我来电话。刘贯文原来在《山西日报》社工作,我们在一起相处多年,是很要好的朋友。他说:“在北京,鲁笏同志让我给你打了几次电话,不知你钻到哪里去了。你写的大寨内参捅了个天大的乱子。”

以后,又听说五级丈量土地队丈量大寨土地,不但没有多报,反而少了。我的思想压力更大。有很长一段时间,害怕见到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当然还没有想到会遇到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

1965年9月,陶鲁笏调到国家经委任第一副主任。临行之前,《山西日报》社召开编委会为他送行。分社两位负责人应邀参加。我在会议室找了个不引人注意的位置,静静听他讲话。散会时在一起照相留念,陶鲁笏见到我便说:“你怎么才来?”我说:“我早来了,一直听你讲话。”散会后他回省委,我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关。陶鲁笏同志是位出色的高级领导干部,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对记者要求很严,倍受山西新闻界的尊敬与爱戴。至今我们仍然保持联系。多

年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得益匪浅。

大寨的耕地，经过一个多月的重新丈量，查田定产，最后核实为796.69亩，比原来上报的802亩，少了6亩。1964年，大寨粮食平均亩产为809斤，跨过了长江。

陈永贵胜利了。

陈永贵认为，我写大寨的内参，是向毛主席、周总理告了他的状，是想砍倒大寨红旗。因此，对我恨之入骨。

1964年春天，周恩来、李先念、罗瑞卿陪同阿尔巴尼亚一个重要代表团去大寨参观、访问，总社让我跟随报道。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省长卫恒的陪同下，那天上午，总理在大寨一面参观，一面当着陈永贵批评大寨还是童山秃岭，山上种树很少，要大寨不仅要发展农业，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也要大搞植树造林，要农林牧副全面发展。

午饭后，周总理陪同外宾回北京，我也离开大寨去阳泉发稿。山西分社摄影记者董荣贵仍在大寨采访。他对陈永贵说：“我们分社李玉秀今日上午也来采访。”陈永贵听了埋怨那位记者，说：“你怎不早说，我要抓住咬他一口。”

1965年12月的一天，我去省委开会，办公厅的几位朋友和我开玩笑，说：“今年，你写了陈永贵的内参，老虎头上摸王字，胆大包天，明年打算捅个什么大漏子？”我笑着说：“那就到明年再看吧！”

倒也是，今年摸了一下陈永贵这个老虎屁股，胆子是大了点。可我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总应该坚持实事求是。这总没有太大的错误吧！

揪到大寨批斗了我十天

1966年8月，山西省“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终于大祸临头。

山西分社另一位副社长去搞“四清”，我在分社主持工作。运动一来，我当然首当其冲。本来我的头上已经戴了一大摞帽子：“现行

反革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分子”、“刘少奇的黑干将”、“蒋介石的黑爪牙”……总而言之，只要社会上流传出一顶什么新帽子，不论我脑袋大小，也不管戴上是不是合适，就给扣到头上。忽然，我头上又加了一顶“反大寨”的又大又重的帽子。这是一顶不同寻常的帽子。对我来说，反正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多一顶少一顶都无所谓。我一直坚持我不是“走资派”，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从来也不反大寨。我也不痛哭流涕去认罪、请罪。所以，人们说我是“顽固不化、死不悔改、铁石心肠”。

我写的《记者反映》，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搞到大寨（至今也搞不清楚）。陈永贵以为抓住了我“反大寨”的真凭实据，如获至宝。

1966年冬天，寒风刺骨。北京到大寨串联的学生，将我和王中青揪到大寨批斗。从太原到大寨，乘坐火车，又换乘汽车，完全和押解犯人一样。当天下午，到达大寨。从村口到住地，道路两旁挤满了学生、农民，他们高呼“打倒王中青、李玉秀”、“反大寨没有好下场！”等口号。这个七八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顿时热闹非凡，到处贴着标语。我还看到一幅很大的漫画，将我画成两副面孔，一半是白的，一半是黑的。漫画说我是既写公开报道，又写内参，是个十足的两面派、阴谋家。

晚上，让我们到食堂排队买饭吃。王中青患糖尿病，吃得很少。他不知道大寨的新规矩，吃完饭以后，将碗筷一丢，扬长而去。刚走到门口，一些年轻人便叫喊起来：“走资派王中青还放不下当官做老爷的架子，还想让人民侍候他，把他揪回来洗自己的碗筷。”几个小伙子立即将王中青拉回食堂。他并不在乎边洗边说：“当惯了官，养成了坏习惯，错误，错误！”我接受了他的教训，饭后洗了自己的碗筷，免遭一场斗骂。

当晚9时，在大寨开始第一场批斗。会场不大，挤满了外地串联的学生和农民。我们进入会场时，两边群众喊着口号，上边用拳

头撞，下边用脚踢，许多人往我身上吐唾沫。陈永贵坐在那里板着面孔，一言不发。批斗会由另一位村干部主持，他当幕后指挥。我是主要批斗对象，王中青陪斗。主持人让我交待向中央写内参，“反大寨”的罪行。当我介绍了写大寨内参的经过，说明我们既写了公开报道，也向中央反映了大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我说，新华社记者是中央的耳目喉舌，有责任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我对毛主席、周总理树立起的大寨红旗，从内心讲是非常拥护的，我并不反大寨，我承认自己对听到的情况，没有经过调查核实，这是错误的，今后一定要记取这一深刻教训。

陈永贵对我的检查态度很不满意，有些人围上来想动手动脚，看看陈永贵的脸色，又退了回去。有些人让我站在板凳上交待反大寨罪行，低头认罪。

陈永贵说，你向中央写内参，说我大寨的耕地802亩不真实，少报了土地亩数，隐瞒了粮食产量。经过中央到县五级联合丈量队，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重新丈量了大寨土地，大寨的耕地只有796亩，比上报的亩数还少6亩。你要把这少了的6亩大寨田给我修起来。大寨人修一亩大寨田要用200个劳动日，我看你这个劳力，恐怕用1000个劳动日也修不起一亩大寨田。你什么时候修起这6亩大寨田，我什么时候放你回去。

批斗会于晚上11时结束。

我们回到住地，贾进才来向我们宣布每天活动的时间安排：上午，在住地写交待“反大寨”的罪行材料和思想汇报；下午，下地参加劳动；晚上9时至11时接受批斗。除吃饭、劳动以外，不许到外面随便走动。

次日早晨，王中青发现我们住地对面窑洞墙上有条大字标语：“砸烂王中青狗头！”他马上喊我去看，并说：“大记者，你看那条标语，砸烂王中青狗头，为什么不砸烂李玉秀狗头？”我笑着说，因为你是省长，你的官大，砸烂你的狗头影响大，意义重大。我是记者，

砸烂我的狗头有什么意思。他严肃地说：“不对，不应该砸烂我的狗头。你是社长，又写了陈永贵的内参，还是应该砸烂你的狗头。”

下午劳动。让我和年轻人上山扛石头，修大寨田，王中青比我大十多岁，分配他跟大寨铁姑娘们去挑土垫地。一天下午，我上山扛石头，几个年轻人将一块大石头抬起来放在我肩上，我哪里能扛得起来，石头从肩上掉下来，砸断了我拇指。十指连心，疼痛难忍。但他们仍然命令我白天劳动，晚上接受批斗。

一天下午，王中青下班回来，进门就说：“啊呀，伙计，今天在妇女们面前大大出丑，败兴，败兴！”原来，姑娘们为照顾王中青年岁大，不让他挑土，分配他用小平车推土。他不小心，连车带土推到沟里，惹得姑娘们捧腹大笑。

讲完这个故事，他很认真地说：“不过我得到一个深刻体会，用车推土比人担挑轻快得多！”我笑着说：“你当了大官，四肢不勤，是应该好好劳动改造一下。”他点头承认：“应该，应该。”

在大寨挨了9天批斗。陈永贵认为，我的态度一直不老实，没有低头认罪，不承认“反大寨”罪行。每次批斗会上，他们总是无限上纲，批判我反对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大寨红旗，反大寨红旗，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罪恶滔天。

第10天上午，王中青忽然对我说：“我们来大寨10天，我深深地感到陈永贵这个人真了不起，有水平。过去咱有眼不识泰山。这个人不愧为真正的英雄。”我莫名其妙地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怎么高明？”他说：“陈永贵这个人高明之处就在于，咱们来大寨10天，他光斗你，不斗我。有水平，不简单。”

说来也巧，他话音刚落，贾进才来了。他对王中青说：“老王，你准备一下，今天晚上给群众交待一下你的问题。”这分明是说今晚要批斗他。贾进才一走，王中青大发脾气，说：“农民就是农民，根本没有一点水平。”我笑着说：“你刚才还说过有眼不识泰山，不到5分钟，一个陈永贵就变成两个陈永贵。”

批斗王中青与批斗我的气氛大不一样。陈永贵仍然在会场坐镇,但不像对我那样拉长了脸,横眉冷对。群众情绪也缓和多了,口号也喊得少了。我第一次当陪斗,就轻松多了。

其实,所谓王中青的“反大寨”罪行,就是那年他在大寨考察工作时,不仅他听了“四清”工作组的汇报,还把我也拉去听,因此才有了大寨内参。其次,他是分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那次在大寨时,曾去小学参观,他说过一句话:大寨儿童营养不良。这就是他“反大寨”的滔天大罪。

在大寨熬过了惊心动魄、终身难忘的10天!

山西造反派夺了山西省委的权,任命陈永贵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他要去太原走马上任,我们才被放回来。饶恕了我为他修6亩大寨田。

在陈永贵的心目中,95%的新闻记者,都是“反大寨”的。记者宣传大寨,宣传陈永贵,却变成他的敌人。我永远不服这口气。

曾任湖北分社副社长的方堤,调到新华总社工作。他想去大寨采访,在太原找到陈永贵,说明来意。陈永贵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方堤。”一听方堤,陈永贵立刻火冒三丈,吼道:“你就是方堤,我正要找你,你来得正好。先不说去大寨采访。我把你揪到大寨批斗10天再说。”方堤十分紧张,摸不着何时何地得罪了陈永贵,问:“为什么要把我揪到大寨批斗?”陈永贵说:“你犯了罪,心里清楚。你是支持李玉秀写‘反大寨’内参的罪魁祸首,还来问我!”方堤被留在宾馆,准备揪到大寨批斗。

那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叫醒,驻山西分社的军代表让我到迎泽宾馆作证。

见到陈永贵,他气呼呼地说:“这个方堤是不是支持你写大寨内参那个人?”我说,不是他支持我写大寨内参。我去总社汇报大寨情况时,总社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同志听过我的汇报。他笑了,说:“不是方堤?我记得有个‘方’字,以为是方堤。”这样,才放方堤回到